

张国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儒林外史》试论



41
2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儒林外史》试论

张国风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近年来取得的部分新成果。

我们教研室包含三个研究方向:古代文论一个方向;古代文学两个方向,一是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一是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古代文论单独一个方向,是研究对象有别;而古代文学内部的两个方向,则是研究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前者着重于材料的搜索与考辨,个案的审察与解析;后者着重于义蕴的探求与阐发,脉络的清理与贯通。用古人的话说,前者旨在“照隅隙”,后者旨在“观衢路”。这两种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人员较少不便分开罢了。

然则,上述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当求两全其美,何可分而治之耶?此言极是。无论研究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立足之根基都是文献考索与个案解析。“隅隙”皆暗,“衢路”何观?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也。而无论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精深之义蕴又都在产生它们的传统文化之中。俯首“隅隙”,何观“衢路”?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也。然则,理虽如此,事或多端。即使皆以两全其美为标的,实际做下来也会各有偏长,各有侧重。此乃“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自然而然者也。因其

自然之势而分之,可使各骋所长,各成其美。与其“汉”“宋”相抵,何如“汉”“宋”并峙?

姚鼐论文之阴阳刚柔,有曰:“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之关系,似亦近于此。考据与义理糅而兼胜,固历来大家之风范,我辈景仰之余,当竭力勉之。“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自当着意免之。至如“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既无醒目之新材料,亦无迈往之新见解,文献考索与文化分析两不相涉,唯以时髦之“话语”餍人者,尤当尽力绝之也。

现在出版的这套丛书,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旨趣。其瑜瑕得失,恭请学界同人与广大读者评判。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人大中文系与中华书局都给予了热诚的帮助。感激之余,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以更好的成果答谢他们的厚意。

小 引

一九三五年，鲁迅曾经在《叶紫作〈丰收〉序》一文里，针对一些看不起《儒林外史》的人，不无讽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曾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迅讽刺了那些看不起《儒林外史》的人们，蔑视了他们的“蔑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知道并喜欢《儒林外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儒林外史》的研究、吴敬梓的生平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与《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儒林外史》研究的规模非但远不及与它同时诞生的《红楼梦》，而且也比不上其他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如《聊斋志异》、《水浒传》。可以说，《儒林外史》的伟大，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描写的重心是知识分子。其他阶层的描写，从属于这一重心的描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揭示

围绕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的性质和特点。

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小说家和戏曲家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历史命运,只是到了吴敬梓的笔下,才得到了那样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吴敬梓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讽刺才能,成功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命运这一具有丰富内容和巨大历史深度的题材。

《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但向读者表明了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和历史命运是什么样的,而且用艺术的形象向读者表明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的。作者通过环境和世态的描绘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环境和世态的描绘十分深刻、十分出色,在小说里很显眼,以至于使有的研究者误以为世态的描写是作者的主要目标。其实,现实环境和世态的描写无不从属于知识分子这一主体的描写。吴敬梓对环境和世态的描写之所以如此深刻,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本书的重点是分析客观方面的原因。所谓环境和世态描写的深刻性,首先意味着这种描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是说,小说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以及知识分子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现实,鲜明地体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色,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描写还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某些特征。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色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涉及到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潮流;其二,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清朝政治。

同时代的思潮与政治是互有区别、又紧紧联系的两个问题。统治者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将时代思潮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一般地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据统治地位

的思想。这就是同时代的思潮与政治的联系。可是,思潮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但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左右,而且受到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的牵制。所以,思潮的演变未必与政治的变动同步。

思潮的核心是信仰,包括政治信仰、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政治的核心是政权,对统治者来说,政治就是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对一般人来说,政治就是对现政权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儒家学说融道德、政治、哲学于一炉,知识分子在时代思潮中吸取何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他对时代思潮的选择。对吴敬梓来说,情况正是这样。他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吸取了批判现实的精神,深化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促使他在太平盛世繁荣景象的背后看到了无可救药的腐败和没落。而他对盛世的失望及至否定,也促使他去向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寻觅批判的武器。《儒林外史》中反复地强调“文行出处”,强调孝悌,既是一种道德的选择、思想的选择,又是一种政治的选择。《儒林外史》与时代思潮的联系,以及《儒林外史》的政治倾向,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目 录

小引	1
第一章 《儒林外史》的思想渊源	1
一 时代思潮的演变	1
二 吴敬梓接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原因	4
三 从《儒林外史》看时代思潮的影响	28
四 康雍乾三朝强调躬行的风气	63
第二章 《儒林外史》的政治倾向	94
一 对盛世的否定	95
二 康雍乾三朝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	106
三 吴敬梓对康雍乾三朝的态度	115
四 《儒林外史》与雍正之治	124
第三章 《儒林外史》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164
后记	172

第一章 《儒林外史》的思想渊源

知识分子的思想往往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思想潮流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们共同的选择和追求。弄清当时思想潮流的趋势及其基本特征,弄清吴敬梓对于这一潮流的真正态度,他的抉择取舍,以及他以何种方式与之发生关系,对于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时代思潮的演变

明朝覆亡、满族入主中原的社会大变动,震动了每一个中国人,震撼了当时整个的思想界。专制的罪恶、吏治的腐败、理学的无用均暴露无遗。思想家们目睹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冷酷现实,身受亡国破家的痛苦,他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即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转向对现实、对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深思、批判和总结。这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封建社会,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所发动的一次批判总结运动。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站在比前人更加雄厚宽广的基础上,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没有他们的这一深刻批判,没有他们对于传统观念和民族惰性的这一巨大冲击,要产生像《儒林外史》这样深刻犀利的现实主义的讽刺巨著,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社会批判中渗透着当时最彻底的史学精神。从来的思想家都没有顾、黄、王那样坚实的历史感。他们一桩桩、一项项地从历史、从制度的演变着眼、仔细地检查封建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每一处细微末节,竭力要找出它的每一个毛病和隐患。他们怀着沉重的历史感伤之情,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总结明王朝覆亡的原因,却并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历史责任。尽管他们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他们自身毕竟有限的认识能力,在当时还不可能懂得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还不可能认识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的苦苦探索,全部深思熟虑的批判和总结,归根到底仍然没有能够冲破儒家思想的传统藩篱。然而,他们对封建社会的广泛批判,那种重制度、重历史趋势而不重个人历史责任的态度,那种正视现实、探索真理的巨大勇气和魄力,依然给后人以很大的启迪和鼓舞。

在顾、黄、王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探索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是他们都意识到,在喧嚣的政治舞台背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把它叫作“势”。所以,“势使之然也”、“其势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①。作为史学观念的“势”,早已孕育于诸子的学说之中^②。至汉代,在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中,时时地提到“势”的概念。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势不可也”之类,并非仅仅是指形势,其中已经包含着“规律”,乃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含义。至唐人,更是多有论及^③。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的概念来说明郡县制的必然性^④。但是,柳宗元并没有将“势”的概念推广到普遍的历史考察中去,更没有使之成为思想界的共同信念。明清之际就不同了。顾炎武就十分喜欢讲“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⑤、“圣人之所不能除也”、“故以今日之法,

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⑥之类的话。王夫之则把“势”的概念阐发得更有理论色彩。

乾嘉时期的社会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于明末清初那个动荡的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在清朝政权业已巩固的时代诞生出来的。他们没有目睹那个阶级危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生当表面繁荣、骨子里危机四伏的盛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能继承顾、黄、王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很多人走上了闭门读书、埋头考证、不问政治的道路,离开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从康熙到雍正、乾隆,随着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日趋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也日趋严厉,经世致用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但是,思想潮流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愿望,并不一定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完全吻合。乾嘉汉学的精髓不就是那种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夸饰的治学精神吗? 阎若璩的“一物不知,以为深耻”、戴震的“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正是朴学大师们严肃的史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吗? 这种精神最接近我国史学的传统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果说汉代经学的精神是“我注六经”,宋明理学的精神是“六经注我”,那么,乾嘉汉学的精神不正是“六经皆史”吗? 朴学大师们以怀疑的态度追溯过去,对魏以后流传的经籍,先儒的经注、经说提出质疑,他们在主观上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他们不逞空论、注重实证,孤证不信,兼容并包,一切务求切实可靠、反对偏激偏胜的作风,正是体现了一种史学的精神。朴学大师的考证,无不穷溯事物的渊源,无不重视制度的演变,重视历史的趋势。乾嘉汉学从信念到方法,从研究领域到研究角度,无不受到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迪。而注重经史、注重考证的顾炎武则恰好成为朴学大师最好的榜样,成为连接前后两大思潮的关键人物。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探讨吴敬梓及其小说的思想渊源是十分必要

的,对于我们理解《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点也是有帮助的。

二 吴敬梓接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原因

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一十九年(1754),正是思想界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向乾嘉汉学思潮逐渐过渡的时期。明清之际思潮的高峰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乾嘉汉学的高峰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吴敬梓恰好生活在两个高峰中间,处在两大思潮的过渡时期。吴敬梓关于知识分子道路、命运的观察和思考,《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过渡时期的痕迹。处在两大思潮之间的吴敬梓,既受到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巨大影响,又受到蓬勃兴起、方兴未艾的乾嘉汉学思潮的某种吸引。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吴敬梓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顾炎武注重经史、注重历史趋势和社会制度的态度,颜习斋关于“礼乐兵农”的学说,明清之际进步思潮对封建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给了吴敬梓一定的启发,使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关于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思考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从地理上看,吴敬梓一生的活动,主要在安徽、江苏两省,旁及浙江等地。其中江苏尤为重要。《儒林外史》就是在江苏的南京写成的。十八世纪的两位文化巨人——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喝过秦淮河的水。吴敬梓在南京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曹雪芹的家族有四代人在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生活了六十年之久。吴敬梓、曹雪芹都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

江苏、浙江是明清时代最富庶、最繁华的地区,是满汉地主阶级剥削的渊藪。康、雍、乾时期,扬州、南京、苏州、杭州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里重迭交错,各种思想在这里竞争、交流,各种学派在这里磨砺着自己

的思想武器。

江浙地区堪称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在清代、近代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江浙人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在清代经学的流派中,吴派的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都是苏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吴派学术给他的启迪不可忽视^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为江苏人。清代、近代的史学大师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章学诚、王国维都是江浙人。清代、近代的文学家中,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思想之活跃、学术信息之灵通,可想而知。

吴敬梓对南京很有感情,对扬州也十分喜欢。他在《儒林外史》中用了很多文字,深情而饶有兴趣地描绘了南京这座“不夜城”的繁荣景象和风俗人情^⑧。在吴敬梓的笔下,可以看到:南京城的建筑雄伟壮观,“人烟凑集,金粉楼台。……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船上的“细吹细唱”,更是“凄清委婉,动人心魄”。“城内万家灯火,那长江如一条白练,琉璃塔金碧辉煌,照人眼目。”南京城的清凉山地藏胜会,“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象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难怪张文虎(天评)就此感叹道:“写秦淮河风景,百世之下犹令人神往!”^⑨吴敬梓在其《移家赋》中,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南京城的山川人文:“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小说中第三十二回,娄太爷临终之际还嘱咐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

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

南京的吸引力还在于这里是六朝故都,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唤起吴敬梓对魏晋风度的无限遐想。《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说,那里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吴敬梓的好友吴蒙泉在《满江红·除夕和敏轩韵》里,说出了两人共同的感受:“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这样描述他在南京的心情:“常扞虱而自如,乃送鸿而高视。吊六代之英才,忽怆焉而陨涕!”

魏晋的名士风流历来为后世的文人所仰慕,尤其是阮籍和嵇康。其中的秘密在于,阮籍、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悲剧命运:参与政治吧,难免同流合污,无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远离政治吧,难免终老林下,一事无成。说到底,封建社会需要人才,但首先必须甘心做奴才。封建社会里最不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想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物。而阮籍和嵇康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试图保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物。礼教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生当这样的时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那就不能不是一个悲剧。阮籍、嵇康之为后代文人所同情,所理解,正在于自魏晋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后世文人之仰慕阮籍、嵇康,吴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籍、嵇康,他们之自比阮籍、嵇康,其原因正在这里。

小说描写南京城的大段抒情文字同作者对五河县的暴露性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五河县正是吴敬梓家乡全椒的影子。它是那么闭塞、保守,那么势利而令人厌恶。《移家赋》中,吴敬梓对家乡的恶俗风气用大量文字来加以猛烈的抨击。人们早就注意

到,吴敬梓在诗文中常常以魏晋的名士吴质自喻。而吴质恰恰和家乡的关系特别不好。《儒林外史》的基本风格是含蓄的,而在小说的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作者却按捺不住自己的厌恶之情,直接站出来,痛斥五河县的势利之风: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作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

“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吴敬梓通过小说中余大先生的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自己那种厌恶和轻蔑的感情。程晋芳《文本先生传》中说:“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⑩、“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⑪,这就是吴敬梓这位“秦淮寓客”^⑫给他最亲密的朋友^⑬所留下的印象。

《文本山房集》里的《移家赋》,是吴敬梓从全椒移居南京后不久写成的,可以看作吴敬梓前半生思想的总结,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当时(三十三——三十四岁)的思想状况。从《移家赋》来看,吴敬梓当时还远未达到创作《儒林外史》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移家赋》中没有一个字批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没有一个字否定功名富贵。恰恰相反,吴敬梓还在赋中为吴家科举发迹的奠基人高祖吴沛大唱赞歌^⑭,还在想象曾祖吴国对探花及第、深得恩宠、富贵荣华、如花似锦的种种情景:

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官烛宵分,花砖月午。张璠网于海隅,悬藻鉴于畿辅,诏分玉局之书,渴饮金茎之露,美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

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颀妆靥，厄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

《移家赋》中，吴敬梓对自己先人以八股起家的历史充满了自豪。高祖吴沛虽然屡挫于场屋，却终于将五个儿子中的四个培养成了进士。而曾祖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是由于刻苦钻研八股的结果，即《移家赋》中所谓“常发愤而揣摩^⑮，遂遵道而得路”。在小说中，吴敬梓借一个反派人物高翰林之口说：

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

场屋中的胜利者在得意洋洋地大谈胜利的秘诀，大谈“举业的金针”“揣摩”二字，在嘲笑场屋中的失败者马二先生。同样的“揣摩”二字，作为“举业的金针”，在《移家赋》中得到热烈赞扬，而在《儒林外史》中却成了贬抑、讽刺的对象。由此可见吴敬梓前后的思想变化有多大。

从《移家赋》中可以看出，父亲去世以后，族人哄抢遗产的一场家难，家道的中落，世态的炎凉，正在激发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可是，仅仅这些因素还是不够的。吴敬梓正是从保守闭塞的全椒，来到了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结识了程廷祚、程晋芳等一大批学者文人，才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从而启发了自己的批判意识，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没有这一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就不可能写出《儒林外史》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

从友人的影响来看，吴敬梓慷慨倜傥、性喜交游，结识了当时

江南地区的很多学者文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经学家程廷祚和程晋芳。程廷祚^{①6},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比吴敬梓大十岁。吴敬梓和他认识时,他已经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程晋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比吴敬梓小十七岁。吴敬梓与程晋芳相识在乾隆六年(1741),当时吴敬梓四十一岁。可见,吴敬梓与二程交往的时候,正是他创作《儒林外史》的关键时期。

程廷祚的年龄、阅历、学问和声望,他那不苟富贵、清高自许的人品,都使吴敬梓把他看作自己的兄长、老师和诤友。小说中杜少卿说“绍光先生是我所师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这一班词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约他”,就影射了吴敬梓和程廷祚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天一评”在这里特意点明:“此其所以为庄绍光知己,不似今人请客,夹七夹八尽此一席”。惟其如此,《儒林外史》的研究者们都十分重视程廷祚这个人物,都把程廷祚视为吴敬梓接受明清之际进步思潮影响的中介。

戴望在《颜氏学记》中说程廷祚的治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州、亭林”。戴望在当时未能看到程廷祚的文集,所以,这个结论是否精确值得考虑。近人支伟成在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里,把程廷祚列在李塨之后,归入北派经学家列传,切断了程廷祚与顾炎武、黄宗羲的联系。1923年,正值戴震诞生二百周年,梁启超作《戴东原哲学》一文以资纪念。梁文提出:“程绵庄(即程廷祚)是当时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后来,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其《儒林外史》的研究中认为,程廷祚“上承颜学,下开戴学”,“到晚年还是一个颜李信徒”,《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扬颜李学派的思想的小说”^{①7}。胡适的观点对近年来的《儒林外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很多人努力地寻找吴敬梓及其小说和颜李学说之间的关系^{①8},而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却始终未能